

中原地区农村居民风险认知及其与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刘金平

(河南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 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与他们的风险认知、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的。对中原地区农村居民风险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 (1) 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结构由 3 个因子构成, 即风险的可能性、风险的可控性和风险的忧虑性, 这 3 个因子共解释了风险认知方差总变量的 53.572%; (2) 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在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不显著; (3) 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他们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4) 农村居民的应对方式在其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减弱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消极的应对方式能增强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关键词: 中原地区农村居民; 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 风险认知; 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C915; B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14)02-0068-06

收稿日期: 2013-05-11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风险认知视角”(122400450005)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金平(1962-), 男, 河南长葛人, 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教授, 心理学博士。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 学术界对城市居民的风险认知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例如, 刘金平等人探讨了城市居民风险认知的水平和结构;^① 崔澜涛、姚本先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② 但是, 对农村居民风险认知等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因此, 研究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 对于我们了解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 通过对客观存在的风险的感受和认知, 在主观上对风险产生的认识、做出的判断和评价, 是个体对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认识, 它是衡量公众心理恐慌的一个重要指标。^③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能够从其所处的社会网

络中获得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帮助。社会支持反映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作用既包括环境因素, 又包括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因素。社会支持是个体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 它给个体提供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 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应对方式是指个体针对外在的环境要求, 以及在其受到相关的情绪困扰时所产生的认知反应, 进而所采取的具有特异性、稳定性特点的行为模式。应对方式与个体的人格特征有关, 也就是说, 不同的个体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不同。同时, 应对方式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 应对方式是伴

① 刘金平、黄宏强、周广亚:《城市居民风险认知结构研究》,《心理科学》,2006年第6期。

② 崔澜涛、姚本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③ 刘金平:《理解·沟通·控制: 公众的风险认知》,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随着个体的成长而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压力的应对模式。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个人生活的综合认知和判断,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总体的概括性认识和评判,是个体各方面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的一种主观合意程度,它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观指标。

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①关于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Rui Zheng 等认为,公众的社会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②因为,风险认知水平过高会引发个体产业焦虑、恐慌等情绪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则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关于社会支持与风险认知的关系,Rui Zheng 等的研究指出,政府支持与社会风险认知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因为,影响风险认知的因素有个体期望水平、风险沟通、知识结构、个体差异等,得到社会支持多的个体在遇到风险事件时,能够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帮助而不会感到孤独无助,不会过度担忧;相反,社会支持不足的个体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会有过度担忧,会产生较强的恐惧感,总觉得风险不可控制。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1: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从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概念来看,风险事件是个体面对的应激源之一。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个体会产生风险认知而采取各种行为方式去应对风险,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进而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2:应对方式能够调节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为了方便取样,同时,又因为中原地区的农村居民在风险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具有普遍性,故笔者选取中原地区的河南省鄢陵县、光山县和汝州市三地的农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800 份,获得有效问卷 603 份,有效率为 75.38%。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 314 人,女性 289 人;已婚者 564 人,未婚者 39 人;有工作者 230,无工作者 373 人。

2.2 研究工具

农村居民风险认知问卷,是对刘金平等编制的城市居民风险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修订而成的。^③该问卷由风险的可能性、风险的可控性和风险的忧虑

性 3 个因素构成,共 15 个项目。经验证,该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好,其信度和效度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其内容结构良好,可以在农村居民中使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是对 Zimet 制作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修订而成的,用来测量个体领悟到的来自社会的各种支持,包括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支持。该量表由 12 个项目组成,包括 3 个因子。其中,第 1、4、7、10 项是家庭支持;第 2、5、8、11 项是朋友支持;第 3、6、9、12 项是其他方面的支持。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④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是由姜乾金根据中国人的特点在借鉴国外应对方式量表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该问卷由 20 个项目组成,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该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此类方式应对压力事件。消极应对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被动、消极的方式应对问题;积极应对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于采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应对问题。^⑤

生活满意度量表,是采用 Diener & Emmons 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该量表由 5 个项目组成,要求被试对自己的一般生活满意度作出主观评价。SWLS 是一个应用较为广泛的多项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其信度系数为 0.86,在国内的应用情况良好。该量表各项目采用 7 点计分方法,将“完全不符合”记作 1 分,然后按顺序逐步发展到“完全符合”并将其记作 7 分。得到的分数越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⑥

2.3 研究程序和统计方法

本文所有调查数据都是通过个别施测的方式获得的。本研究采用 SPSS19.0 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以探讨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探讨应对

① 刘金平:《理解·沟通·控制:公众的风险认知》,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6 页。

② Rui Zheng, Kan Shi, Shu Li,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Societal Risk Perception”, *Complex Sciences*, 5(2009).

③ 刘金平、黄宏强、周广亚:《城市居民风险认知结构研究》,《心理科学》,2006 年第 6 期。

④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年,第 131—133 页。

⑤ 姜乾金、祝一虹:《特质应对问卷的进一步探讨》,《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9 年第 3 期。

⑥ 崔澜涛、姚本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

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社会支持、风险认知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笔者采用 Pearson 积差分析法对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生活满意度间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情况 ($n=603$)

	1	2
1. 社会支持	1	
2. 风险认知	-0.362**	1
3. 生活满意度	0.359**	-0.507**

注: ** $p < 0.01$ 。

表 1 显示,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程度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p < 0.01$),这为

后面对三者的回归分析做好了准备。

笔者采用 Pearson 积差分析法对生活满意度与风险认知、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生活满意度与风险认知应对方式的相关矩阵 ($n=603$)

	1	2	3
1. 风险认知	1		
2. 生活满意度		-0.507**	1
3. 积极应对方式	0.049	0.367**	1
4. 消极应对方式	0.250**	-0.219**	-0.356**

注: ** $p < 0.01$ 。

表 2 显示,生活满意度与风险认知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程度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p < 0.01$),这为后面的分层回归分析做好了准备。

表 3 分层回归结果:风险认知的中介 ($n=603$)

变量	第一步 生活满意度		第二步 风险认知		第三步 生活满意度	
	β					
控制变量						
性别	0.000	-0.011	-0.028	-0.018	0.000	-0.019
婚姻	0.106	0.094*	-0.152**	-0.140	0.106	0.033
年龄	0.002	0.029	0.022	-0.004	0.002	0.027
教育水平	-0.034	0.017	0.140*	0.090	-0.034	0.056
工作状况	0.053	0.086	-0.073	-0.106	0.053	0.040
收入情况	0.030	0.024	-0.059	-0.053	0.030	0.001
自变量						
社会支持		0.358***		-0.352***		0.206***
中介变量						
风险认知						-0.433***
F	1.413	87.070***	4.997***	86.739***	1.413	130.810***
R ²	0.004	0.130	0.038	0.159	0.004	0.286
R ²	0.014	0.126***	0.048***	0.121***	0.014	0.15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3.2 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检验

Baron & Kenny 认为,对变量中介作用的检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2)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显著;(3)当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进入因变量回归方程时,中介变量的效应显著,而自变量的效应消失(完全中介作用)或者减弱(部分中介作用)。

笔者采用 Baron & Kenny 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状况、收入水平)之后,分别做生

活满意度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风险认知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以及生活满意度对社会支持、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3。

第一步,检验了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由表 3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358 ($p < 0.001$)。第二步,检验了社会支持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风险认知的影响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353 ($p < 0.001$)。第三步,在将社会支持和风险认知同时纳

入回归方程来解释生活满意度时,风险认知的效应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33($p < 0.001$);社会支持的效应也同样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05($p < 0.001$),但是相对于第一步来说,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有所减弱,因此可以得出,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3.3 应对方式调节作用检验

对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即当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时,用带乘积项的回归模型作分层回归分析:(1)做因变量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到

测定系数 R_1^2 ; (2)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回归分析,得到测定系数 R_2^2 。若 R_2^2 显著高于 R_1^2 ,则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显著;若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则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显著。

3.3.1 对积极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首先,本研究构建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然后,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风险认知、积极应对方式,以及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对积极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和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的检验($n=603$)

变量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控制变量				
性别	0.000	-0.015	-0.001	0.000
婚姻状况	0.106 *	0.029	0.024	0.025
年龄	0.002	0.013	0.073	0.066
教育水平	-0.034	0.037	0.089	0.083
工作状况	0.053	0.016	0.034	0.030
收入水平	0.030	0.000	-0.040	-0.034
自变量				
风险认知		-0.507***	-0.531***	-1.210***
调节变量				
积极应对			0.405***	-0.452**
乘积项				
H×G				1.134***
F	1.413	196.411***	161.173***	39.819***
R ²	0.004	0.250	0.410	0.446
R ²	0.014	0.245***	0.158***	0.037***

注:H×G为风险认知和积极应对方式的乘积;* $p < 0.05$,** $p < 0.01$,*** $p < 0.001$ 。

从表4可以看出,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1.134($p < 0.001$),达到了显著水平,生活满意度增加的方差解释量为3.7%。笔者采用温忠麟等判断调节作用是否显著的标准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另外,表4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风险认知的回归系数为-0.507($p < 0.001$),生活满意度的方差解释量为24.6%,这说明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是极其显著的。

为了进一步检验积极应对方式对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以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调节变

量的积极应对方式进行分组,并分别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在高积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显著($\beta = -0.339$, $p < 0.05$);在低积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达到了显著水平($\beta = -0.817$, $p < 0.001$),这说明积极应对方式缓冲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即当应对方式较为积极时,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能力减弱。

3.3.2 对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检验。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首先,构建风险

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然后,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以风险认知、消极应对方式,以及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风险认知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510($p < 0.05$),达到了显著水平,生活满意度增加的方差解释量为0.5%。

笔者采用温忠麟等(2005)判断调节作用是否显著的标准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消极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了调节作用。另外,表5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风险认知的回归系数为-0.507($p < 0.001$),生活满意度的方差解释量为24.6%,这说明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是极其显著的。

表5 消极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中的调节作用的检验($n = 603$)

变量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控制变量				
性别	0.000	-0.015	-0.017	-0.017
婚姻状况	0.106	0.029	0.021	0.022
年龄	0.002	0.013	0.014	0.015
教育水平	-0.034*	0.037	0.041	0.040
工作状况	0.053	0.016	0.010	0.008
收入水平	0.030	0.000	-0.008	-0.013
自变量				
风险认知		-0.507***	-0.484***	-0.765***
调节变量				
消极应对			-0.097**	-0.451*
乘积项				
H×G				0.510*
F	1.413	196.411***	7.019***	3.940*
R ²	0.004	0.250	0.258	0.268
R ²	0.014	0.245***	0.009**	0.005*

注:H×G为风险认知与消极应对方式的乘积;* $p < 0.05$,** $p < 0.01$,*** $p < 0.001$ 。

为了进一步检验消极应对方式对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在高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显著($\beta = -0.458, p < 0.001$);笔者在低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上作生活满意度对风险认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达到了显著水平($\beta = -0.252, p < 0.05$),这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增强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即当应对方式比较消极时,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能力增强。

4 分析与讨论

笔者对中原地区农村居民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通过风险认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以往的研究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

客观因素,如生活事件、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化关系等;另一类是主观因素,如个体的认知能力、价值观、自尊等。本研究的数据显示,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笔者认为,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能够获得较多的物质帮助,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同时,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他们在遇到坎坷或面对不幸时可以得到各方面的精神援助,从而减轻他们的精神痛苦。因此,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风险认知影响生活满意度。由于社会支持度高的个体能够得到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社会网络的较多的帮助与支持,他们在面对风险时所产生的忧虑会比社会支持度低的个体少,因此,社会支持与风险认知呈负相关。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只是起到了

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风险认知之外,社会支持有可能通过影响其他变量来影响生活满意度,这是值得今后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为了检验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笔者采用温忠麟等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①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和应对方式的乘积项在回归方程中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证明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了调节作用。再作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其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减弱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消极应对方式增强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从生活满意度的适应理论和应对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并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调节应对方式以应对良性或恶性事件,因此,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在面对客观风险事件时,人们会通过客观风险事件的感受和认知,在主观上对风险产生认识并做出判断和评价,这种对风险的认知从而会引起个体的情绪体验,进而会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Rui Zheng 等的研究为此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发现人们的社会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②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应激源时的认知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个体的内部自我结构紧密相连,同时,它也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如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在中原地区的农村居民面对风险事件而产生风险认知之后,如果他们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就会减弱由风险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如果他们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增强由风险事件带来的不

良后果,进而就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由此可知,积极应对方式缓冲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消极应对方式增强了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5 结论

笔者以中原地区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系统考察了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考察了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通过风险认知来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2)分层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原地区农村居民的应对方式在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了调节作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减弱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增强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晋少登硕士做了大量工作,谨此致谢!)

①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2005年第2期。

② Rui Zheng, Kan Shi, Shu Li,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Societal Risk Perception", *Complex Sciences*, 5(2009).

(责任编辑 焦薇缜)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Support of Central Plains Rural Residents

LIU Jin-pi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isk perception's intermediary func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coping process' regulatory function between the risk percep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Results show: (1) The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isk of rural residents cognitive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three factors: the possibility of risk, controllability of risk and the dreadfulness of risk, which can explain the risk cognitive variance by 53.572% of the total variance; (2) The risk perce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income level. But it is not apparent in other demographics; (3) The risk perception plays a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i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s relationship; (4) The coping process to deal with the risk aware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 plays a regulatory role. The positive coping process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negative coping process enha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Key words: Central plains rural residents; social support; coping process; risk perception; life satisfaction